

以宋为媒 探寻普陀绚烂古韵

□ 沛文

● 海上贸易航线 靠泊天然良港

之前拜读了“浙江宣传”公众号发布的《落子宋韵，浙江深思熟虑》一文，作为一个地方历史爱好者，笔者对浙江“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这一举措不由心折首肯。

纵观舟山的古代历史，自有先民定居直到商周时期，以神话与传说为主，鲜有系统性文物支撑。

商周伊始，东海海域的船舶制造行业已具雏形，春秋后期吴越争霸时船舶的主要用途依旧是海上作战。秦汉时期，船舶的应用更加广泛，与日本、韩国以及各东南亚国家开始了初步的贸易，逐步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其中我们熟知的“孝女沈清”这个故事的背景也是依托于两晋时期与高丽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唐朝开元二十年(公元738年)，舟山被设为翁山县。地处浙东地区前泊的舟山群岛，自此成为了真正意义上通往东亚、东南亚各国航线的靠泊地和咽喉要道，渐渐铸就了东海上风头无两的地域文化。

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舟山工作站于2010年在六横岛发现了龙头跳沙埕，这是舟山地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海港码头。经过初步分析，专家认定这座码头始于唐代，更是在其中发掘出了大量自唐末到明清的瓷器碎片作为佐证。

另据专家考证，在唐代，东亚各国遣唐使路线之一的南路航线始发点就是翁山县(今舟山市)，该县东部也就是如今的普陀区，更是遣唐使必经之地。

两宋时期，舟山的海上贸易更为兴盛。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曾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认为舟山“其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连瓯闽，西通吴会，实海中之巨障，足以昌壮国势焉”，所以奏请朝廷重整舟山县治，舟山由此得名“昌国”。

根据成书于南宋宝庆年间的《昌国县志》记载，昌国县下辖富都、安期、金塘、蓬菜四个乡。其中富都乡涵盖了如今沈家门、勾山、芦花、展茅、螺门等地，安期乡涵盖了普陀山、朱家尖、六横、虾峙、桃花、登步等岛屿，这两个乡基本覆盖了如今普陀所处的区域。

受到宋金战争的影响，南宋迁都至临安(今杭州)以后，随之由中原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全面辐射浙江地区，区域内的经济、手工业、航运贸易借此契机都提升到了空前繁盛的状态。

厘清了舟山全域繁盛于宋代的原因，笔者依据现存的古籍文献和考古发现粗略展现一下当时普陀范围内的风貌。

观至两宋时期的“富都乡”域内已经有了沈家门这个地名。沈家门作为明州航线的始发站也是终点站，向来是商队使团靠泊候潮、补充淡水和食品的必经之地。

结合《宋史·高丽传》和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北宋朝廷分别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派遣使团出使

高丽国，这三次航行过程中均途经沈家门。第三次航行途中，奉议郎徐兢更是率领船队一行登上过沈家门渔港，并举行了祭海仪式。

除两国之间正常邦交以外，舟山市博物馆整理展出的宋代与高丽国来往贸易记录显示，自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建立明州(今宁波市)市舶司专门管理航线贸易以来，北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到

● 开放包容氛围 兼顾农商发展

在《昌国全景图》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安期乡”域内，梅岑山(今普陀山)的正南方和西南方有两座岛屿分别名为“马秦山”和“顺母山”，大致就是如今朱家尖所在的范围。马秦山上设有“保安院”和“马秦坊”两处地标。

如今，朱家尖大青山西荷庙的古碑上有载，宋高宗赵构离开昌国县返回临安(今杭州)前，后官中人称“西荷娘娘”的皇妃留恋马秦山的海天美景，不愿追随离去，由此获得恩准留下来生活，余生多次前往岛上的保安院焚香祷告。这座被皇妃多次造访的保安院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63年)，在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由宋廷赐匾更名，

占地达到了可观的“产田149亩，山1229亩”，直到元朝又被扩建了将近一倍之多。数百年间，香客络绎不绝，寺院亦是焕发生机。

彼时被称为“桃花山”的桃花岛和“黄公山”的六横岛也各设有一处寺院，名字分别为“封宁院”和“广福院”，规模稍小。

另据南宋宝庆年间文献《昌国县志》的记载，马秦山的马秦坊、桃花山的昆斗坊、黄公山的王公坊是昌国县境内十五家酒坊的其中之一。这十五家酒坊酿酒主要供给客商和居民饮用，每年上缴给地方州府的税额能达到一万九百二十七贯一百八十八文，平均下来每家酒坊能达到七百余贯，可见当时酿酒行

南宋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这两百多年间，明州始发的海上航线甚为繁忙。其中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高丽使团抵达明州时一次性带来了贡金100两，白银1000两，绛罗200匹，人参500斤。而光是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这一年，从明州前往高丽国贸易的人数就达到了327名。

两宋时期，明州航线上商船往

来之频繁远超人们的想象。经过现代考古发掘，在当时航线所处海域打捞出了青釉六棱瓷执壶、青釉刻花瓷碗、青釉瓷碗、青釉高圈足瓷碗等宋代瓷器及残片，足以说明这些商团对外贸易时携有产自越窑、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以及福建窑口等地的外销瓷器，这些精美瓷器的数量之巨又足以说明它们受到了亚洲邻国的热烈追捧和喜爱。

业的兴旺发达。

从当时“安期乡”域内浓厚的佛教氛围和星罗棋布的酒坊设立这两个现象中可以看得到，该地往来人流量不低，其中酒坊行业的兴盛更是间接说明了与之相关的农业、手工行业以及航运业欣欣向荣。

两宋时期，盐作为一种战略物资被实行了严格的“禁榷制度”。宋廷对此限制相关行业的民间贸易并且派驻了相应的监官，沈家门东南处的芦花场因为毗邻海洋，光照充足，成为了得天独厚的露天晒盐的绝佳之地。《昌国全景图》上标识的芦花场与现在的芦花村所处位置不尽相同，但也有所相交。这片土地在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被宋

廷开辟为盐场，前期因为划分不当，疏于治理，效益不佳。历经南宋淳熙十年(公元1178年)新监官鲍渭上任和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升为具有规模的正场后，芦花盐场的管理逐渐规范起来。根据《昌国县志》记载，当时除了舟山三家大盐场年产在一万袋以上，芦花盐场和高南亭盐场年产量各自能达到三千六百袋左右。

北宋庆历年间，出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也多次亲临黄公山(今六横岛)，指导当地村民兴修水利、疏通河道、修建鱼塘，施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又在渔民群体中推行渔贷法，这些举措均取得了收效，更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 名流纷至沓来 富集文化遗存

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因为宋金战争的影响，真歇清了禅师从南京迁居梅岑山(今普陀山)，通过当时的郡守奏请宋廷，将当地佛教“易律为禅”，住持改建于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的宝陀寺(今普济禅寺)。自此，当地佛教和寺院经由几代禅师的努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慕名前来求学的僧众也越来越多。随着南宋时期对外交流的频繁，梅岑山的禅宗佛教更是名扬海外，由此出现了像曹洞宗这样一心传承禅宗的日本僧人。

而梅岑山上的这座宝陀寺也在南宋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由宋廷特批再次扩建，达到“常住田567亩，山1670亩”的惊人规模。

五十多年后南宋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6月，58岁的诗人陆游慕名而来，游览宝陀，登山观海，有感而发书写下了《好事近 登梅仙山绝顶望海》一诗，其中“数烟帆历历”这一句最能体现当时普陀山附近海域帆樯如云的景象。

南宋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秋，耄耋之年的陆游再次在这座岛

屿上留下了“海上乘云满袖风，醉打星斗蹶虚空。要知壮观非尘世，半夜鲸波浴日红”的诗句，昭示着这位伟大诗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参悟了人生的真谛。

通过像陆游这样的大诗人两度游览梅岑山(今普陀山)可以推测出，当时名士文人必定对这一方净土趋之若鹜，或许因为没有留下只字片语，所以难以让后人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觅到他们来过普陀山的踪迹。

除了南宋诗人陆游以外，当时宋

廷名臣黄龟年与梅岑山(今普陀山)、马秦山(今朱家尖)也颇有一段渊源。时任太常博士的黄龟年在宋金两国交锋期间多次率领战船接应宋高宗赵构，并且保卫了当时都城临安(今杭州)以及江浙地区免受战火荼毒。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熟识东南沿海环境的时任给事中黄龟年曾经带着家眷在马秦山(今朱家尖)大青山隐居七年之久。在隐居期间，黄龟年和其弟黄鹤年与当地的僧人、居士相交甚欢，为两地留下了不少石刻和佳句。

● 历史一脉相承 古今遥相呼应

再次回头看两宋相关史书和地方志，我们会发现当时安期乡境内的“登部岛”“马迹山”“东霍山”这些岛屿地名随着岁月的变迁已演化成了“登步岛”“马峙岛”“东福山”，“正螟山”也更名为了“蚂蚁岛”，但仍然可以从一些地名的方言读法中窥探到星点演化痕迹。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宋人专门在《宋宝庆昌国县志·纪变》中专门记载了当时乌石塘有三处：马秦沓

(朱家尖)、下塘头千步沙、桃花沓。他们认为海浪长时间“卷砂以为堤或堆石以为塘，中成膏腴，不以人力”是形成这些乌石塘的原因，还在记录的末尾处感叹“沧海变桑田，非虚言也。”直到现在，我们依旧沿用着“乌石塘”这个叫法。

两宋时期，当时人们对于鲳鱼、蛎房、蛭子、鰻、乌贼、梅鱼、河豚、鲈鱼、马鲛鱼等这些海产叫法与现在也是相差无两。文献中对于这些海鲜外形描

述更是能让我们这些后人阅读时切身体悟到穿越千年的亲近之感。

纵览两宋历史，会发现这三百多年的时间中，宋廷在唐及五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海上贸易发展的成果，便是在田赋之外又拥有了商业税这一项重要收入。南宋时期部分年份的商业税收甚至能够占到总财政收入三分之一。可见，对外贸易活动的繁荣，不仅有力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更是在运输、手工业和商业领

域提供了就业机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并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格局。

以史为鉴，知来处，明去处。通过大到如《宋画全集》这样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第一期项目，小到各地博物馆举办的宋代文物展，能深刻感受到先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和文化底蕴。我们更是需要从中找出合适的文化传承点，助力我们支撑和滋养当下发展。